



王仲榮著作集

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

中華書局

王仲犖著作集



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

王仲犖 著
鄭宜秀 整理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王仲犛著;鄭宜秀整理. - 北京:中華書局,2007.11
(王仲犛著作集)
ISBN 978-7-101-05577-1

I. 敦… II. ①王…②鄭… III. 敦煌學-歷史地理-考證 IV. K928.642 K87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4124 號

王仲犛著作集

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

王仲犛 著

鄭宜秀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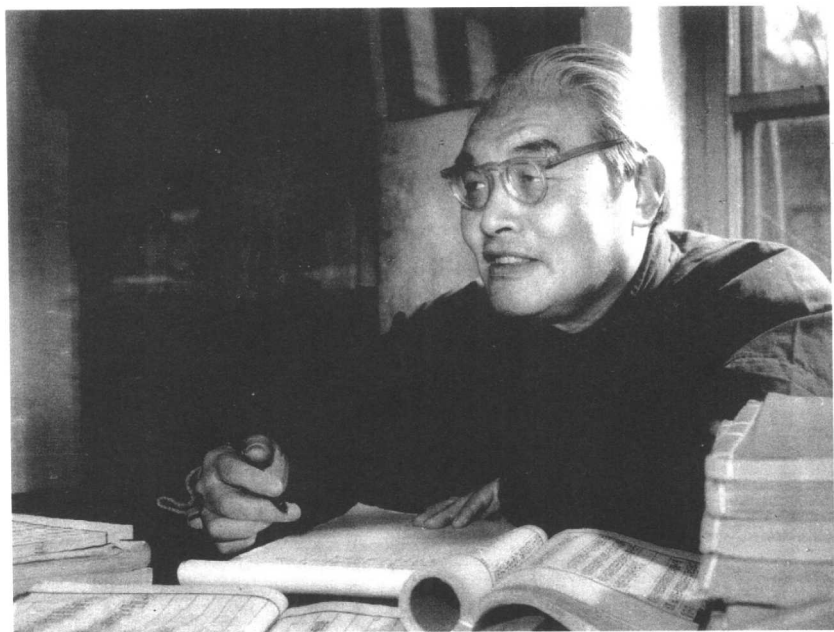
*

850×1168 毫米 1/32·10%印張·2 插頁·207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24.00 元

ISBN 978-7-101-05577-1



作者像

前記

感謝中華書局的諸位先生，能够給我這個機會來向讀者介紹這套著作集的作者王仲羣先生。這套著作集裏的大部分書的第一版是在二十七年，一九八〇年的十二月。這些書最初的寫作是始於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後幾經修改加工，終於在文革以後的那個燦爛的春天裏得以出版。全集裏的這部《西崑酬唱集注》對於王仲羣先生而言，確有着特殊的意義：這是他的第一部專著，也是他惟一一部關於文學方面的專著，而從這以後，他便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歷史方面去了。從王仲羣先生衆多的專著，如《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嵎華山館叢稿》、《金泥玉屑叢考》、《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嵎華山館叢稿續編》等等，我們可以看出王仲羣像每一個史學家做的那樣，做他認為該做的事情：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既無所謂對，也無所謂錯，把它再現出來少加評價吧。而通過這套著作集，我們却可以看見王仲羣先生的另一面：七十年前那個開始寫作這本書的二十歲青年，是怎樣讓自己靈魂在中國最燦爛的文化裏翱翔。那時的他，在上海，踱步在他少年時走過的石板路上，透過十里洋場紛繁的慾望，看着家門前的松柏青翠依舊，初經人世的他

感喟着生命的無常，是否也像當年的蘇軾一樣考慮過鴻飛那復計東西的人生意義呢？

王仲孳先生生於一九一三年。早年師承於章太炎先生，後在三十年代末期就職於當時的中央大學講授國文。四十年代中期由於人事傾軋，離開中大赴青島任山東大學教授。說起由於人事原因而離開中大似乎與他的為人頗不相符，他在生活中屬於那種為人笑容可掬而又不失頭腦的讀書人，讀書人微笑裏含着的睿智與超脫往往是很動人的，尤其是當這種微笑面對着人事的磨難與困苦的時候。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青島的山大，海邊的天空很藍，岸邊緊靠海水浴場的魚山路常常有馬車走過的踢踢聲，這聲音和隱約的海浪聲交織在一起，會把陽光裏的寧靜襯托得很美。從海洋深處傳來的清馨會從窗臺上一直流到你的心裏去，從這裏，沿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陽光，你不僅可以感受到遙遠天邊透着深藍色的內涵，更可以让你跨越時空去考慮在這顆渺小如塵埃的地球上所發生的歷史。在這期間他開始整理《西崑酬唱集注》，北周的六典與地理及動筆寫魏晉隋唐的斷代史。

啓蒙老師任堇先生於書法的教誨此時像刀刻一樣明晰：「學書從篆隸入手，無他道也，取其一直一橫而已。取篆之一直，取隸之一橫，直不撓曲，橫不欹斜。思之思之。」這些話成爲王仲孳作史的主要原則。「歷史是自己譜寫的」。王仲孳在後來曾這樣說過，歷史不是史家隨意做出來的，如果在歷史上加油加醬，其結果就會出「史」界，這樣的「歷史」就不能成爲「史」。在斷代史的寫作中，在當時的情形下寫作往往變得很艱難，最讓他感到愉悅的是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文化與佛教。而後

者是由外邦傳入中國後融合入中華文化，實際上已成爲我們這個一心向善民族傳統思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關於文化方面，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李商隱，李商隱的詩如人，空明而圓潤，在歷史繁雜的囂聲裏，曲高和寡的李商隱顯得明麗而又大器，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能創造出一個非常完美的世界。而這個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個時代的黑暗襯托下，誠如雨天裏的布穀鳥，近處聽着，它的叫聲沒有別的鳥兒響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國秋雨的煙朦中傳得很遠。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這樣的輕鬆。在我們的歷史中，有着太多的遺憾與殘酷，在這裏，王仲羣先生作爲一個史學家當然無法回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這些專著的寫作，的確給他提供了一個可以回避的場所。

作爲一個浸潤於我們祖國傳統文化的文人，王仲羣以他特有的倜儻與瀟灑來面對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過五十年代末後，被借調入北京標點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幾年的時間裏他獨自生活在北京，對這段生活筆者也無從瞭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詩句「十年踏破萬街塵，老至愁經客子春」能夠說明他的情況，而這的確意味着他能避開「文革」衝擊的喧囂，讓他在工作之餘，在這份難得的平靜裏得以整理自己的舊著。作爲近代的史學家，像王仲羣先生著作之豐碩是不多見的，這要得益於這段平靜。

一九八六年，王仲羣先生溘然長逝在他自己的書房裏。而我們能够做到的就是從這套著作集的字裏行間，去尋找作者靈魂的痕跡，那些非常美麗的痕跡。

收入《王仲犖著作集》的各書，原係不同出版社出版，此次對所有原書《前言》均予以保留，未加刪削，以資參考。

《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三書，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許可據其原版重印，對他們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〇七年六月鄭宜秀於濟南山東大學嵒華山館

序言

我國古代，設官分職，職方掌管地方圖志。如《周禮·夏官》云：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在唐代，封建國家更重視修製地圖地志，立有相應的制度。按《唐六典》「五尚書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條略云：

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舊唐書·職官志》：「候」作「墩」）之數，辨其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蕃〕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

《唐會要》五九「尚書兵部職方員外郎」條：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諸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五年一選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新唐書·百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條亦云：

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這一制度唐代前後期都在實行，前期是三年一造，後期改爲五年。負責這項工作的職方是兵部的一個曹，可見設立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爲國防提供地志資料。職方曹藏有全國州府的地圖地志，全國各個州府也藏有本地區的地圖地志。仲肇先生輯錄在此書中的《沙州都督府圖經》、《西州圖經》以及《沙州伊州地志》等就是上述修造地圖制度實行的結果。根據制度的內容以及「圖經」這一名稱，這些地方志應以圖爲主，而輔之以文字說明。仲肇先生輯錄在此書中的地方志都是殘卷，因此其地圖部分可能已亡佚，所殘存者祇是很不完全的文字部分了。

唐代中期，由宰相李吉甫撰編的《元和郡縣圖志》在體例上和內容上有它自己的創造，但圖與文並列這一體例在此之前就已存在，李吉甫遵循傳統的體例，並依據修撰的目的（供皇帝閱覽，以製定削平藩鎮的策略）有所發展創新，但他的基本依據仍不出全國各州府的地志。唐代能出現像

賈耽、李吉甫這樣傑出的地理學家，和當時封建國家修造地圖地志的制度是分不開的。

修造地志，是唐代一項涉及全國軍事及經濟財政的制度，而現存的敦煌唐地志無疑是我國學術文化上的寶貴遺產。敦煌所出唐地志，雖然為數不多，但却是研究唐代地理歷史以及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仲肇先生於此書中對這些唐地志進行整理，並加以精湛的考釋，此書的價值及意義於此可見。

仲肇先生此書，不但對唐代的地志進行了整理考釋，為治唐史者提供了價值很高的原始資料，而且也展現了他博學多識的史才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例如在《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中有下列一段：

臺貽廟 《春秋》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貽，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太原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故立廟於此。

校釋曰：「師」字據《左傳》昭元年補。「嘉」原訛「家」，亦據《左傳》改正。「諸」字據《左傳》補。

在《燉煌錄》殘卷考釋一文中，有下面一段：

州西有陽關，即古玉門關，因沙州刺史陽明詔追拒命，奔出此關，後人呼為陽關。接鄯善城，險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關後移州東。

考釋曰：玉門、陽關，漢武帝時已置，無改玉門爲陽關事，亦無以沙州刺史陽明奔出此關，故名陽關事。玉門移州東北則有之，陽關亦無移關事。

以上兩則考釋看來雖然簡單，但如果對《左傳》、《史記》、《漢書》不熟悉，就難以發現問題，或者雖然能看出問題，却無法解決問題。由於仲犖先生對經史很熟悉，所以能如此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地解決了問題。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注意敦煌學研究的基礎。絕大多數敦煌文書是用古代漢語寫成的，整理研究敦煌文書，首先必須讀懂這些文書，爲此，就必須具有相當高的古漢語和古代文史之學的基礎知識，否則，很難讀懂敦煌文書。這就要求敦煌學研究者必須扎實地用功熟讀經史文獻，一字一句地讀敦煌文書。那種不通讀全文，只摘取爲我所需的三兩行片言隻語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其次，就敦煌世俗文書來講，多數文書寫於唐代，內容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學、宗教多方面，因此，就要求研究者一定極爲熟悉唐史，對唐史有豐富而準確的知識，熟悉並通解唐代的典章制度，否則，閱讀敦煌文書要遇到很大困難，甚至讀不懂。最後，使用敦煌文書去研究歷史問題，一定要與史籍文獻相結合，互證互補，因此，不十分熟悉唐代史籍文獻，使用敦煌文書也有困難。以上所論述三個方面，仲犖先生的這部著作，都可以作爲我們的楷模。

綜上所述，我認爲，仲犖先生這部著作，一方面提供了便於使用的敦煌地志資料；另一方面，

他的考釋爲我們提供了整理研究敦煌文書應有的態度、道路、方法以及學風，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的意義更深更鉅。

王 永 興

一九八七年九月於北京大學朗潤園

目 錄

序 言……………王永興……………一

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考釋……………一

貞元十道錄劍南道殘卷考釋……………七六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九〇

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考釋……………一九九

沙州志殘片三種考釋……………二四二

燉煌錄殘卷考釋……………二六〇

瓜沙兩郡大事記考釋……………二六七

張孝高事蹟考……………二七三

燉煌氾氏人物傳考釋……………二七七

《壽昌縣地鏡》考釋·····	一八四
《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考釋·····	一九六
《西州圖經》殘卷考釋·····	二〇八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考釋·····	二五
《西天路竟》箋釋·····	三〇八
後記·····	鄭宜秀·三〇七

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考釋

敦煌博物館藏敦煌文書第五十八號地志殘卷，向達教授定名為唐天寶初殘地志，吳震先生定名為《敦煌石室寫本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並為之校注。馬世長先生定名為《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向公、馬君偏重於地志，吳君偏重於公廨本錢之記錄。今從向說，定名為《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並為之考釋。原卷正文郡名，既多並列，夾行小注，又多緊密銜接，今並改為單字直排，郡名下加「郡」字，州名下加「州」字，鄉數下加「鄉」字，京都道里距離下加「里」字，公廨本錢下加「貫」「兩」「千」等字，郡縣等第，據馬、吳之文別為補文加字，附列州郡縣名之下、鄉數之前。正文頂格寫，考釋低兩格寫。

（前缺）

同谷〔郡〕成〔州〕〔下〕 京一千卅〔里〕 都一千九百〔里〕 貢蠟燭 本七百七十〔貫〕 上祿〔中下〕 五〔鄉〕 三百卅〔貫〕 長道〔中下〕 四〔鄉〕 三百卅〔貫〕 同谷〔下〕 三〔鄉〕 一百廿五〔貫〕

考釋曰：成州治上祿，今甘肅西和縣南洛峪鎮。長道治今甘肅禮縣東南三十里長道鎮。同谷

治今甘肅康縣咀台子。

成州去西京東都道里數：《通典》至京一千卅里，至都一千八百里。《元和郡縣圖志》至京一千
里，至都一千八百六十里。《舊唐書·地理志》至京九百六十里，至都一千八百里。

武都〔郡〕武州〔下〕 京一千二百里 都二千卅里 貢蠟燭 本七百七十〔貫〕 將利〔中下〕 六〔鄉〕 三百卅

〔貫〕 覆津〔下〕 四〔鄉〕 二百一十〔貫〕 盤堤〔下〕 二〔鄉〕 一百九十六〔貫〕

考釋曰：武州治將利，治今甘肅武都縣東南。覆津景福元年（公元八九二年）改福津，治今甘
肅武都縣東南。盤堤治今甘肅文縣東北五十里臨江鎮。

武州去西京東都道里數：《通典》至京一千二百里，至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圖志》至
京一千三百里，至都二千六十里。《舊唐書·地理志》至京一千二百九十里，至都二千里。武
州領三縣凡十二鄉，與《元和郡縣圖志》開元鄉數合。

隴西〔郡〕渭〔州〕〔下〕 京一千一百里 都二千一十里 本九百八十〔貫〕 襄武〔中〕 四〔鄉〕 四百卅〔貫〕

隴西〔中下〕 三〔鄉〕 三百卅〔貫〕 鄆〔中下〕 三〔鄉〕 三百卅〔貫〕 渭源〔中下〕 四〔鄉〕 三百七十

五〔貫〕